

陈红民:中国大历史,也要看海的那边

对中国现代史学而言,海外汉学在实际上起着引领风气的作用。中国现代史学特质的形成、史学潮流的兴替,与海外汉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尤其是2007年,蒋介石日记在斯坦福大学开放,海内外掀起学术热潮。人们不得不承认,追寻民国史真相,必须留意海的那边。

从八十年代在南大接触海外汉学,到四次访问海外汉学重镇——哈佛燕京学社,民国史学者陈红民成就了中外学术交流史上的一段传奇。

今年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“海外中国研究丛书”出版30周年,现代快报读品周刊对与丛书关系密切的陈红民教授进行了专访。

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



陈红民认为,“海外中国研究丛书”从总体上对构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起了非常大的标杆作用 现代快报记者 牛华新 摄

1

1982年,陈红民考上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,师从茅家琦、张宪文诸先生,成为大陆高校系统首位民国史方向的研究生。

八十年代,中国刚从文革废墟中走出,社会秩序、学术研究等都亟待重建,在史学领域,人们早已看腻了由政治主导的空洞的史学论述,急需一股新鲜的空气。

《万历十五年》应时而来。在开篇里,黄仁宇以颇具画面感的方式叙述了1587年3月2日早上的情景。陈红民至今还记得初读时的震撼:啊,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!

另一位美国中国史学家史景迁的著作在国内同样畅销。史景迁把断裂的历史资料,通过想象进行整合,将其变成有血有肉的人。

彼时的陈红民,得益于南京大学活跃的学术交流,开始接触海外汉学尤其是海外民国史的研究。当时王庚武、易劳逸等国际汉学界大咖,都曾先后到南大访问。后来成名的裴宜理,也从美国来南大留学。

最大的机缘是在1983年,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生、后来任爱知大学副校长的砂山幸雄来南大留学,陈红民作为“陪住生”,和砂山同吃同住一年,进一步加深了对海外中国研究的了解。

通过砂山幸雄,陈红民第一次读到了美国著名的中国史学者易劳逸的《流产的革命》,当时还是复印本。易劳逸提出,国民党在掌握权力后,很快就失去革命动力,而变成以维护权力为重心的军事独裁。

应该说,这一观点符合大陆学界的主流观点,但美国人那套实证的方法,与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乏味的表述迥然不同,这对陈红民触动很大。

1986年,易劳逸来南大访问半年,此时的他已经出版了《流产的革命》的“续集”《毁灭的种子》。这两本书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,成为对国民政府进行学术研

究的新标准。这也是陈红民日后翻译易劳逸著作的一个重要契机。

虽然民国史研究从一开始就雷区密布,荆棘丛生,但另一方面,机遇和挑战同在。陈红民这拨学者的成长是和学科发展同步的。

“我们当时做民国史的时候,老师们也刚刚转入这个领域,我们和他们几乎同时起步,你可以随便找个题目占山为王,成为专家。”

硕士论文《九一八事变后的胡汉民》是陈红民的成名作。从某个人物或某个时间点切入历史的纵深,这是海外学者惯用的方法。但在当时,却得风气之先。

著名历史学家、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看到这篇论文后,非常高兴,不仅推荐发表在《历史研究》上,还特意跑到南京,主持学术座谈会专门讨论。那是1985年,也是那一年,广州市人民政府为胡汉民另建了新墓,算是重新盖棺。

2

1996年,陈红民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学。作为海外汉学研究重镇,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的中国现代资料让他吃惊。

“没想到有那么多关于胡汉民的资料,惊喜到有点傻眼了。”陈红民就跟时任社长杜维明教授说,研究胡汉民是他最拿手的,他想放弃原来申请时的题目,回头再做这方面的研究。杜维明很支持,说燕京给所有访问者最大的学术自由。

1996年到1997年,九个月的时间里,陈红民每天泡在燕京图书馆的“善本书室”,特地买了台当时还很稀罕的笔记本电脑,一个字一个字把这些资料敲了进去。当时的馆长吴文津跟他说:“我见过最多三个月每天来图书馆的,但没见过九个月天天来的。”

最后陈红民的博士论文《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:“胡汉民往来函电稿”研究》,就是以这批资料为基础写成的。对如何处理这批资料,杜维明提醒他,要留意胡汉民往来函电里的人际网络研究,因为这个研究

套路美国很流行。

陈红民的用功给哈佛人留下极深印象。2002年,陈红民第二次访问哈佛,恰逢燕京图书馆刚刚入手蒋廷黻的资料,新任的郑炳文馆长委托陈红民将这批资料整理出版,因陈手头忙于另一项研究,一直未能腾出时间。直到七年后,陈红民第三次来哈佛,才着手做这项工作,此时的他已从南大转入浙大。其间清华大学有学者表示愿意出资整理,因为蒋廷黻曾做过清华历史系主任,他们很看重。但被郑馆长婉拒,表示已经托付给了陈红民。

“我在哈佛燕京也差不多是一个传说。哈佛燕京是1920年代成立的,一直坚持一个原则,那就是机会均等。资助的都是其他途径比较难得到钱,没有去过美国的人文科学者。不过我比较特殊,我前后去访问过4次,3次是由他们资助的,这是之前没有过的特例,也算是一种殊荣。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做得比较好的缘故。”陈红民说。

3

现在,陈红民的关注重点在蒋介石及其相关研究,推动相关研究的学术化和国际化。

2006年,陈红民离开南大赴浙大任教,次年建立了海内外首个蒋介石研究的专门机构——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,先后四次主办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,主编了第一套“蒋介石与近代中国”学术研究丛书,担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“蒋介石资料数据库建设”的首席专家。

2007年,蒋介石日记在斯坦福大学开放,随即掀起学术热潮。海内外学者纷纷涌入胡佛研究所抄日记。“蒋研中心”先后有10多位教师和研究生去阅读日记,在这场“蒋介石日记热”中没有缺席。

陈红民去过三次。通过阅读日记,纠正了他过去的一些认识。“比如以前曾认为蒋信教只是实用主义。读到日记后,才发现蒋介石是个蛮虔诚的基督教徒。”

陈红民

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、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。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,国家社科基金评委,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。陈红民教授学术交流广泛,三次获得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资助,赴哈佛大学访问研究。



扫码看访谈视频

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30周年特别报道 ①



中国故事的海外视角
——陈红民海外访谈与讲述

对话

丛书对于学科构建起到标杆作用

读品:您参与过海外中国研究丛书《德国与中华民国》的翻译,请谈谈这本书的翻译出版过程。

陈红民:这本书最早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,潘平找我们翻的。新译本于2006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。这套丛书里有些不是初翻,是别人家出过,他们再出。把过去散在各处的珍珠集中在一起而大放异彩,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特点。

读品:这本书对您的历史研究有何启发?

陈红民:它提供了历史研究的连贯性视角。过去我们喜欢把历史分时期研究,可能政权更替是这样,但社会文化习俗却不是。比如谈中德关系,民国时期的重工业很多是德国人帮着我们造的,1949年以后,除了苏联援建了一部分,很多钢铁厂都是德国以前造的,所以中德关系结下的成果不是到1949年就戛然而止了。

读品:丛书中的哪些书令您印象深刻?

陈红民:罗兹曼的《中国的现代化》,90年代初我在南大给研究生上课,一直用它来做教材。那时候做现代化研究,连最基本的概念和界定都没有,只能用别人的。当然我们后来批判它批判得很厉害,但你的批判是建立在向它学习的基础上的。你只有在了解、熟悉、超越它之后才能去批判它。周策纵的《五四运动》影响也很大。还有萧邦奇的《血路》,似乎回到了我们《史记》的传统。

读品:今年是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30周年。在您看来,“海外中国研究丛书”对学术界的影响何在?

陈红民:1980年代,中国学术界百废待兴。传统的文史哲面临着如何发展的问题;新兴学科如社会学、法学、经济学面临着重建的问题。“海外中国研究丛书”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、模仿的对象。很多著名学者都是这套丛书的译者。所以说,这套书从总体上对构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起了非常大的标杆作用。

读品:海外中国研究对国内史学研究发展有何启发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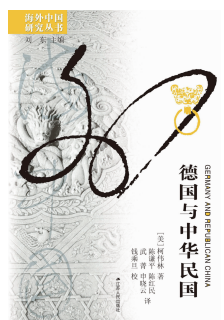
陈红民:这是毫无疑问的。西方学者善于解释新史料,有机地运用自己的叙述;他们不同于中国久已习惯的历史观念、叙述方式和评价立场,让那些看惯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读者感到了惊奇和兴味。

读品:海外中国丛书依然在生长、壮大,您认为还有哪些书可以收进来?

陈红民:陶涵的《委员长》,蒋介石的一本传记。原来在西方,尤其是在美国,蒋介石一直是贪婪、腐败、独裁的形象,相当的负面。到了陶涵这本书,里面讲蒋介石为中国现代化做了很多的努力。



《毁灭的种子》
[美]易劳逸著,王建朗等译



《德国与中华民国》
[美]柯伟林著
陈谦平、陈红民等译



《中国的现代化》
[美]罗兹曼编
国家社会科学基金“比较现代化”课题组译